

# 需求与资源：一项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研究

赵 芳

**摘 要：**在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中，因环境资源供给的不足，产生了适应性困难，影响了流动儿童的自我发展。帮助流动儿童适应，应认识到他们与本地儿童在生命历程及自我发展上的差异，了解流动儿童对环境变化和压力的反应，确认他们的需求，并针对需求从家庭学校、城市社区两大系统增加资源的供给，发展他们有效适应压力的能力，帮助他们在与环境互动时形成自主感和愉悦感。

**关键词：**流动儿童；需求；资源；适应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3-0080-07

**作者简介：**赵芳，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人类行为发生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具有多样性的背景中，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有着对需要有效回应的生物、心理和社会需求，对个体、家庭和群体的需求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被称为适应<sup>①</sup>。帮助群体适应的关键是要理解群体的适应过程。

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从流动儿童（在西方称为移民儿童）进入新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所要完成的社会任务来分析流动儿童的适应状况<sup>②</sup>，我们的研究更希望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入手，分析流动儿童的适应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流动儿童的需求和资源供给状况。

##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一种二元论视角（Dual perspective）。这种视角用于在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理解少数群体的行为、态度和反应模式。该方法力图证明这样的事实，即每个人都是主流社会系统和涉及个体情绪、生理状态的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个体是在与这两个系统的交互作用中产生自我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选择的<sup>③</sup>。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因环境的差异，会经历不同的生命历程，从而影响了他们不同的自我发展，影响了儿童对自身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在同辈群体前评价自己。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将不可能认识流动儿童真实的需求，也就无法针对流动儿童的需求提供有效的资源供给。本研究将影响流动儿童的主要系统界定为城市系统、学校和家庭系统，其中城市是主流社会系统，学校和家庭是涉及流动儿童情绪体验、生理状态的社会系统，分析流动儿童与这两类系统的互动、资源供给状况。

本文研究假设：（1）流动儿童与城市、学校与家庭的互动，期待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资

收稿日期：2010-10-29

①③ [美] 乔斯·B. 阿什福德等：《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王宏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15—16 页。

② 曾守锺：《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源供给欠缺；（2）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形成其自我认知与情感体验，影响其自我发展；（3）流动儿童的自我发展呈现的不是该年龄阶段一般儿童的特点，是流动儿童的独有表现，与本地儿童自我发展存在差异；（4）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受到就读学校类型及就读模式的影响，不同的学校类型和就读模式具有不同的资源供给状况，产生不同的需求。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定量研究中立意抽样调查方法。首先在城郊选取了一所流动儿童学校，从该校抽取四、五、六年级学生共 391 人，一至六年级流动儿童家长 630 人进行问卷调查；其次，在杨浦区抽取一所流动儿童较多的公立小学，抽取 206 位流动儿童，92 位流动儿童家长，116 位本地儿童，94 位本地儿童家长进行了调查；第三，在虹口区抽取一所以本地儿童为主、有较少流动儿童的公立小学，抽取本地儿童 116 人，本地儿童家长 195 人进行调查。这样立意抽样是为了解决单纯一所学校流动儿童调查可能带来的局限，完成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实证比较，并通过儿童家长的调查数据对调查结论进行进一步求证与深入分析。

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向每位流动儿童调查对象发放两份问卷，分别为自编《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调查问卷》和自编《流动儿童家庭状况调查问卷》，对非流动儿童也发放两份问卷，分别为自编《上海市儿童生活状况调查问卷》和自编《上海市儿童家庭状况调查问卷》。其中前者由儿童自行完成，由于填答的需要，选取的样本都在三年级以上，当场填答收回；后者由儿童带回家给父母填写，次日收回。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由 SPSS 11.0 进行统计分析。

##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流动儿童样本有效回收 601 人，其中男生 335 人，占 55.7%，年龄在 7—16 岁之间，平均年龄 11.2 岁；来到上海 2 年以上的有 80.8%，其中 81.0% 的孩子不是出生在上海，而是随父母来到上海，正在经历一个不同环境和文化的适应过程。流动儿童家长有效回收问卷 722 份，其中男性 396 人，占 54.9%。流动儿童家庭中平均人口数为 4.32 人。47.8% 的家长是在城市打拼一段时间后，才把孩子接过来的，29.9% 的家长是一开始到城市打工就带着孩子，总计有 77.7% 的孩子并不是出生在城市。这个数据和学生问卷中将近 81.3% 的孩子不是出生在城市基本相吻合。流动儿童父母的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分别占到 77.0% 和 83.4%，虽然父母教育程度的中位数都在初中，但母亲的教育程度远低于父亲，有 84 位母亲没有上过学。

本地儿童样本有效回收 232 人，男女生均为 116 人；平均年龄 10.9 岁；家庭平均人口数 3.53 人。本地儿童家长样本有效回收 289 人，其中男性 123 人，占 42.6%；平均子女数 1.17；父母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以上的占 61.7% 和 52.0%，父母的教育程度的中位数都在高中。

## 三、研究分析

### 1. 流动儿童与城市系统的互动

我们的调查因为方法学上的考虑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社区，但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影响流动儿童适应的主流社会系统加以了考察。在与城市的互动中，面对不同于老家环境和文化的上海，68.7% 的孩子表示喜欢上海，流动儿童是否在城市出生和对上海的喜爱程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对于城市和老家生活习惯差别，84.6% 表示能够适应，51.0% 的流动儿童喜欢大城市的生活习惯。可见，流动儿童对上海的感受是积极的，对于融入这个城市也有很好的期待，但与城市互动后，实际的情况与他们的想法之间是否有距离？

调查中，在提及对老家和上海的感情时，有 80.2% 的孩子表示家乡让他们更有亲切的感觉；与城市互动时，只有 7.2% 的孩子会说上海话，44.2% 的孩子有上海朋友。为了考察上海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接纳程度，我们设计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调查结果见下页的表 1、表 2。通过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有近 1/4 的本地儿童在接纳流动儿童上存在犹豫和排斥，家长在此项调查的结果上也显示出明显的排斥性。曾守铨教授在上海的一项实证研究中也发现：在公立学校中，85.2%

的教师虽然赞成公办学校招收流动儿童入学，但他们担心学校招收太多的流动儿童会使上海市民不乐意把子女送来上学；59.7% 的教师认为“管理上海本地学生就已经很难很累了，再加上要管理流动儿童，会使教师不堪重负”；17.9% 的教师对是否“欢迎流动儿童到自己任教的班级就读”持否定态度；33.7% 的教师认为“流动儿童流动性较大，把大量精力花在他们身上不划算”<sup>①</sup>。两个研究都证实，这个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这些流动儿童的准备，尤其成年人的社会排斥更为明显，这些排斥不可避免地在城市的社会政策、社会认知、社会心理、社会行动上呈现出来，流动儿童与城市的互动仍有资源上的障碍，仍然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表 1

本地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接纳（%）

n = 232 人

	愿意	说不清	不愿意	合计
你愿意和外来务工人员孩子在一个班级读书吗？	71.2	14.8	14.0	100
你愿意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成为好朋友吗？	74.6	11.3	14.1	100
你过生日是否愿意邀请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来参加生日宴会？	74.8	13.9	11.3	100

表 2

本地儿童家长对流动儿童的接纳（%）

n = 289 人

	愿意	说不清	不愿意	合计
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读书？	58.9	22.2	18.9	100
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同一个班级读书？	52.3	26.1	21.6	100
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成为好朋友？	67.4	18.0	14.6	100
是否愿意邀请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参加自己孩子的生日聚会？	62.9	19.1	18.0	100

2. 流动儿童与学校系统的互动

按照埃里克森的个人生命周期理论，流动儿童的年龄阶段正处于“勤奋对自卑”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儿童的主要发展任务是通过与同伴之间的交流而发展自我价值感，对积极的发展结果的重要影响来自于学校、学习和老师的教育与鼓励<sup>②</sup>。在与学校的互动中，96.6% 的孩子对现在的学校满意，在这个问题上，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的感受差别不大，民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感受差别也不大，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喜爱程度和满意度比民工子弟小学稍高，但也只有 1—2 个百分点的差异，说明流动儿童对学校的满意度都较高。但是在具体证实这个结论时，我们发现了具体指标与此结论的矛盾之处。

在与老师的互动中，有 16.5% 的流动儿童“在课堂上经常不能明白老师的讲解”，有 19.6% 的学生认为老师上课不能吸引自己；有 16.1%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意见常被老师不加考虑地反对；19.5% 的流动儿童指出常常因老师误解自己的行为而被训斥；有 48.1% 的流动儿童认为老师很少和自己倾心交谈；44.0% 的流动儿童表示老师不了解自己的心事；43.9% 的流动儿童表示在学校找不到一位能倾诉心里话的老师；有 36.1% 的流动儿童提及老师常常让自己感到紧张和不安；有 70.4% 的学生表示“当老师找我时，我感到紧张”。调查证实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在与老师的互动中有距离感，存在资源获取上的障碍。

在与同学的互动中，流动儿童表示“同学经常嘲弄我”、“很难交朋友”、“和别人合不来”、“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我只看不参加”比例分别是 19.4%、28.9%、14.8%、22.5%。四个问题相互验证，调查的效度较高，证实近两至三层流动儿童在学校的同伴群体交往上存在问题。

这些指标的数据令我们很惊讶，但这是不是所有这一年龄阶段孩子的共同问题呢？是不是所

① 曾守锺：《教师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研究》，《教育导刊》2008 年第 7 期。

② [加] 居伊·勒弗朗索瓦：《孩子们——儿童心理发展》，王全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有学校、老师和同学都给孩子同样的感受呢？为了解释疑问，我们对本地孩子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本地孩子在这些指标的数据明显偏低（见表 3），流动儿童在与学校、老师与同学的互动中与本地儿童存在明显差异。

除此，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民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间的差异，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认为“经常不能明白老师的讲解和老师上课不能吸引自己”的比例明显要更高；但“你的意见常被老师不加考虑地反对”、“老师常误解你的行为而训斥你”的比例，公立学校却比民工子弟学校要高。在与同学的互动中，数据显示民工子弟学校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与同学互动的情况更差。也就是说，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受到就读学校类型及就读模式的影响，不同的学校类型和就读模式具有不同的资源供给状况，产生不同的需求。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资源，包括师资和学校硬件条件等无法满足孩子的需要；公立学校教师对流动儿童的标签作用更加明显，教师对流动儿童有排斥；民工子弟学校中流动儿童之间的互动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与同学之间的互动还要差，这显然与学校的教育有关，民工子弟学校在培养流动儿童与同学相处的教育上资源投入不足，而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的互动虽没有特别的障碍，但明显不如本地儿童之间的互动好，学校在帮助两个群体间友好相处，减少群体间差距的教育资源上同样投入不足。

表 3 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与学校的互动比较（%）

	流动儿童	本地儿童
在课堂上经常不能明白老师的讲解	16.5	6.8
老师上课不能吸引我	19.6	8.5
我的意见常被老师不加考虑地反对	16.1	4.3
常常因老师误解我的行为而被训斥	19.5	9.4
老师很少和我倾心交谈	48.1	18.3
老师不了解我的心事	44.0	16.2
在学校找不到一位能倾诉心里话的老师	43.9	19.7
提及老师常常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	36.1	12.8
当老师找我时，我感到紧张	70.4	49.6
我的同学经常嘲弄我	19.4	15.4
我很难交朋友	28.9	5.1
我和别人合不来	14.8	7.7
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我只看不参加	22.5	6.0
总人数	N = 601	N = 232

### 3. 流动儿童与家庭系统的互动

从乡村来到城市，是流动儿童家庭经历的一次重要变革，是整个家庭生命周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带来了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个体的发展任务与家庭发展任务并举，家庭适应与个体适应叠加在了同一时空内。

流动带来怎样的新的家庭生态？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除了在住房面积上大部分家长提出与老家时的情况相比更差了外，在其他的选项上，都在向好的方向变化，尤其是在经济收入、生活环境、家庭氛围方面，58.2% 的父母对生活的满意度有了提高。这样，流动儿童与家庭的互动背景有了改善。孩子和父母的问卷调查都显示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关注都在提高。在具体的教育模式上，前几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流动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着父母一味责骂、惩罚孩子，父母间相互推诿、互相指责，教育方法简单粗暴、缺乏民主的情况<sup>①</sup>，但是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却发现流动儿童的家庭互动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有 75% 的父母会和孩子讲道

<sup>①</sup> 参见张翼、风笑天《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论流动儿童所面临的畸形社会化》，《当代青年研究》2003 年第 1 期；赵娟《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现状》，《社会》2003 年第 9 期。

理,51.1%的孩子表示父母会和孩子谈心,62%的父母会带孩子外出游玩,64.3%的父母会给孩子买课外书。这些数据是通过父母和儿童的同时调查相互验证的。在孩子们的调查中,老家出生的孩子中,认为现在和父母相处时间比在老家多的达到了31.2%,认为父母现在比以前更关心自己的有49%。55.4%的流动儿童认为来到城市后和父母在一起的开心事情多了,71.8%的流动儿童认为父母对自己是理解的。可见,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互动越来越朝正向的方向发展。

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还存在另一方面,具体表现在:

(1) 父母教育能力的缺失。85%的父母有时会责骂和打孩子;对于孩子的最大困扰是什么,有65.4%的父母表示几乎不知道。在表扬自己、带自己外出游玩、买课外书和支持自己的兴趣爱好方面,父母“经常”会这么做的比例仍然较低;有24.9%的父母从不和孩子“讲道理”(本地儿童只有0.9%),48.9%的父母从不和孩子进行深入内心的交流(本地儿童11.1%),35.7%的父母从不给孩子买课外书(本地儿童1.7%),31.4%的父母从不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本地儿童4.3%),28.1%的父母从不表扬自己的孩子(本地儿童2.6%),都超过了1/4。

流动儿童的父母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与本地儿童家长相比,有差距但并不如我们预想的明显。有期待,但实际的互动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在调查中,我们一直在思考,这究竟是一个行为问题,还是一个认知问题?

本次调查所涉及到的流动儿童父母的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在孩子们的问卷中我们看出,45.7%的父母从不辅导孩子的功课(本地儿童只有9.4%),究其原因27.5%的孩子选择了“功课太难,他们不会”,56.2%的孩子选择了“他们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在被问及“你是否认同孩子学习成绩好坏都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64.6%的家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为了测量他们的真实意愿,我们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个题“您愿意参加一些由学校举办的家长辅导小组吗?”有52.6%的家长表示愿意,其中有28.8%的家长更是表示非常愿意。这都说明不是认知上的问题,而更可能是一个行为能力的问题。

在进一步地分析中,我们想确定,资源的有效输入是否会改变流动儿童家庭互动的现状。为此,我们比较了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家庭与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家庭。数据证实,在公立学校读书的流动儿童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更高一些,平常与孩子的互动更多,经常抽空和孩子聊天、陪孩子出去游玩、给孩子买课外书、听取孩子意见、支持孩子兴趣爱好的比例都比民工子弟学校家长的比例要高,从不辅导孩子功课的比例则少得多,说明家庭不断地受到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系统的影响,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输入,家庭是愿意也会发生改变的。

(2) 生活压力的代际转移。移民是人们所经历的事件中最有压力的事件。流动家庭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传递给孩子。在工作场所中受到的挫折和歧视会在家庭内部和外部引发攻击性或敌对的态度和行为<sup>①</sup>。在我们的调查中证实了这一观点,有61.3%的父母表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孩子发火;而有37.8%的父母表示心情不好时会打孩子。父亲和母亲表现不同,有5.7%和43.3%的母亲经常/有时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孩子,而这两个比例在父亲这里则是1.3%和35.0%,相比较而言,母亲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情绪迁移或者发泄到孩子的身上。

(3) 文化习得差异导致的代际间冲突。在调查中有67.7%的流动儿童家长认为来到上海后,大城市的生活习惯与家乡相比有很大的差别,能够完全适应的只有19.8%,还有13.6%的人表示他们更喜欢家乡的生活习惯;虽然有62.5%的人赞同上海人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但在实际生活中,有59.5%的人在上海的朋友大部分仍是外地打工者,还有6.1%的人表示在上海没什么朋友;更有64.5%的父母感到自己在城市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显然,作为流动儿童的父母同样存在适应上的困难,与前文孩子们的数据相比,他们的适应状况还不如孩子。居住地的迁移不仅带来家庭地理位置的变化,更多的一种文化上的适应。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故土的

<sup>①</sup> [美]贝蒂·卡特等:《成长中的家庭——家庭治疗师眼中的个人、家庭与社会》,高隽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价值观、信念系统与城市的价值观、信念系统公然对立的时候，文化同化上的冲突就会上演。流动儿童通常学习新语言及吸收新文化的速度比父母更快，因为他们还处于内在文化体系形成较不稳固的年龄阶段。在迁入地，孩子们能经常在学校接触到老师和同龄人，而父母由于原有的文化体系已经相对稳固，他们不容易接纳新的文化，人际圈的范围也会有意识地局限在原生地的朋友之间，固守自己旧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这种文化习得速度的差异会造成代际间的文化冲突。当我们问到孩子“爸爸妈妈会帮助你适应新的生活习惯吗？”54.7%的孩子给了否定的回答。

父母在日常生活状态下非自觉地完成“示范”，儿童也是在日常生活状态下非自觉地“效仿”，人类子代就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完成了生存方式中最基本部分的塑造。在流动儿童家庭中，父母教育能力的不足、压力的无法舒缓以及代际间文化习得的差异导致家庭无法提供流动儿童成长所必需的资源，给流动儿童的适应带来不利影响，虽然有些问题无法避免，但增加资源供给，如提高父母的教育能力、舒缓家庭的压力、增加情绪管理和代际沟通的技巧等无疑会帮助流动儿童减少这种适应困难。

#### 4. 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及情绪体验

正如安德森和卡特指出的那样，任何问题除了与环境相关之外，都和一个人自身的感觉有关<sup>①</sup>，因为它是影响人与环境持续互动的要素之一。正是上述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流动儿童形成了独特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又成为一种要素，反过来影响了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

表 4 流动儿童自我认知 (%) n = 601 人

	非常	有点儿	说不清	有点儿	非常	
笨拙的	6.9	52.2	23.3	15.1	2.5	聪明的
偷懒的	4.1	20.6	29.4	32.4	13.5	勤奋的
自卑的	5.2	15.4	32.9	27.3	19.2	自信的
懂事的	5.3	13.4	22.4	37.1	21.7	叛逆的
很有主见的	6.2	19.5	37.9	26.8	9.6	缺乏主见的
没有理想的	7.2	7.9	22.9	27.4	34.6	有理想的

表 5 本地儿童自我认知 (%) n = 232 人

	非常	有点儿	说不清	有点儿	非常	
笨拙的	0.9	7.7	11.1	55.6	13.7	聪明的
偷懒的	2.6	19.7	17.1	34.2	16.2	勤奋的
自卑的	5.1	8.5	21.4	25.6	28.2	自信的
懂事的	3.4	8.5	10.3	30.8	35.0	叛逆的
很有主见的	3.4	15.4	16.2	29.9	23.1	缺乏主见的
没有理想的	5.1	6.0	12.0	21.4	46.2	有理想的

从表 4 与 5 的比较可以看出，流动儿童自我认知的清晰度要远低于本地儿童，选择“说不清”的比例较高，但在具体选项上两者间又有差异，本地儿童在“叛逆”和“缺乏主见”上比例远高于流动儿童，而流动儿童在“笨拙”和“自卑”上的比例要远高于本地儿童。

再进一步的分析，流动儿童男女生在自我认知上没有体现出性别上的差异。而除了在是否有主见上和年级差异无关外，其他五个维度都和年级有关（本地儿童的调查，没有显现出其自我认知与年级有很明显的相关）。流动儿童三年级的学生自我认知最为模糊；四年级学生自我认知

<sup>①</sup> Anderson & Carter,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 Social System Approach*, New York: Aldine, 1990.

的清晰度在增加，但认为自己笨拙的比例也在增加；五年级学生与四年级相比，自我认知的清晰度进一步增加，但认为自己笨拙的比例依然在上升，达到近 80%，同时，在这一时期认为自己有理想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达到了 83%；但到了六年级，流动儿童自我认识的模糊程度重又全面上升，经历一番寻觅，理想的光芒似乎重又黯淡，相反，叛逆感却在明显增加。

为了比较全面地评估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利克特量表，从情绪方面再次测得流动儿童的自我意识。通过测量显示 28.9% 的流动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19.2% 的流动儿童经常感觉悲伤，22.5% 的流动儿童认为“我给家里带来了麻烦”，22.3% 的流动儿童易于泄气，36.8% 的流动儿童常常感到担忧。与本地儿童比较，调查显示只有 8.5% 的本地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经常感觉悲伤、易于泄气、常常感到担忧的比例分别是 12.8%、9.4%、19.7%，明显低于流动儿童。经过相关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很难交朋友、和同学合不来与其“经常感到悲伤”或“易于泄气”的情绪体验相关，尤其“我和同学合不来”与情绪体验的相关系数最高，明显高于认为“我给家里添麻烦”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而“在学校里我表现不好”却与这些消极情绪体验没有相关。这一结论显示了流动儿童在学校与同学互动是影响其情绪体验的最重要因素，同伴支持成为流动儿童首要的适应资源。

## 结 论

人类是不断成长、变化、与环境进行持续互动的主体，环境的变化会给人们带来正常的压力与需求，人类拥有潜能帮助他们自动地调适以寻求与环境的平衡，但人类的天赋与环境资源供给的相互作用才是增进人类适应的最终因素。在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流动儿童的成长历程因家庭的流动而发生了改变，他们面临新环境的压力，有许多适应性需求，而环境资源供给的不足，使得流动儿童产生了适应性困难，这些困难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自我发展。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经历不同的生命历程，而不同的生命历程影响了他们不同的自我发展。这种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了儿童对自身的看法、情绪体验以及他们如何在同辈群体前评价自己。这些差异是不应忽视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将不可能认识儿童真实的需求，也就无法针对儿童的需求提供有效的资源供给。因此，我们应认识到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在生命历程及自我发展上的差异，了解流动儿童对环境的变化和压力的反应，确认他们的需求，从环境层面加以干预。社会政策的制定以及相应的社会服务的提供应针对流动儿童在与家庭、学校及城市社区互动中出现的资源缺失，尽可能增加有针对性的资源供给，帮助流动儿童发展出更为有效地适应压力的社会技能，并在与环境互动中形成自主感和愉悦感。

（责任编辑：薛立勇）

## Demand and Resource: A Study of Adapt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Zhao Fang

**Abstract:** Adaptation is the ability that can response to the demand of human effectively. The key to help the group adaptation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up process of adaptation. During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migrant children are difficult to adapt the society because they lack of supply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at affect migrant children's self-development. To help migrant children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 in the life course and in self-development between the local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We should understand migrant children's reaction to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identify their needs, and add to the supply of addition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from the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We will help migrant children develop their social skills and form their sense of ownership and pleasure when they inte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Demand; Resource; Adaptation